

左莱 梁化群著

苏区『红色戏剧』史话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研 究 丛 书

苏区“红色戏剧”史话

左 莱 梁化群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研 究 丛 书

苏区“红色戏剧”史话

左 莱 梁化群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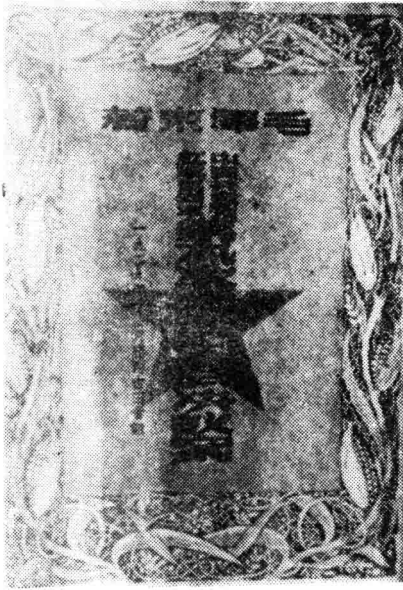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1,000 插页 6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8228·160 精装定价 3.90 元

ISBN 7-5039-0008-3/J·2



苏区出版的文件和报刊



油印出版的“红色戏剧”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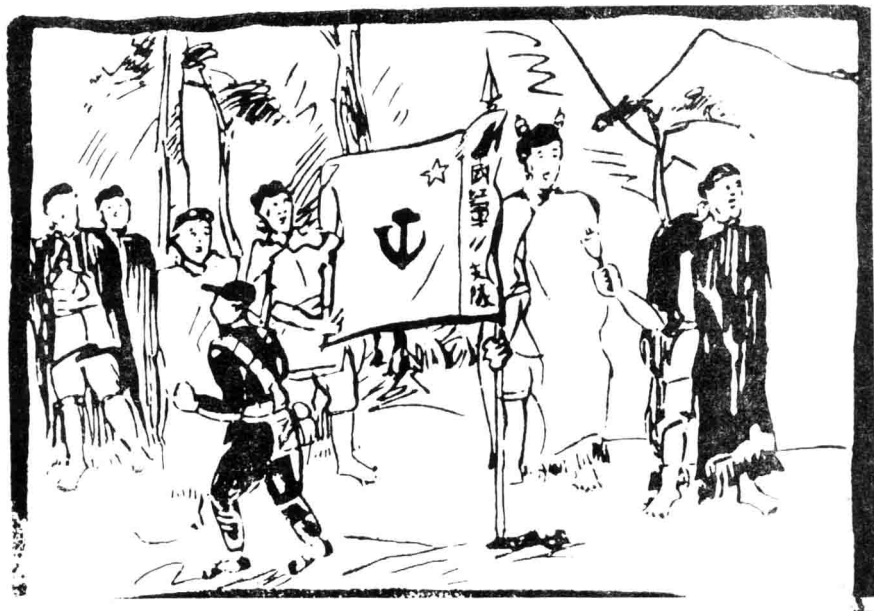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战地演出（罗海涛作）



前沿阵地对敌宣传（罗海涛作）



黄镇作长征速写

序

胡 可

本书叙述的这段重要的却不大为人知道的历史，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我是怀着十分激动喜悦的心情读完这本书稿的。我的激动和喜悦，不仅因为自己身受过“红色戏剧”的熏陶，它唤起了我许多的回忆和联想；更因为它满足了我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多年的渴望，希望看到这段历史的比较完整的论述和对这段历史的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弥补上我国话剧运动史中的这块空白。

我国的话剧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在它的前期，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我国的话剧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之下发展着；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苏区的和后来解放区的戏剧，更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面向工农兵，服务于革命战争，与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戏剧互相配合，而形成了光辉的独具特色的篇章。但是，由于苏区“红色戏剧”所处的极端艰苦的环境和战争的严重破坏，许多剧本和材料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这就使得后来这一部分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而长期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记得五十年代，总政治部曾着手搜集苏区和解放区的军队文艺史料，谁想仅有的一点成果又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以致今天我们的这部分工作竟不得不借助于国外学者积累下的材料。

令人欣喜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总结历史

经验的工作已提到日程上。拿文艺史而言，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正在编写中国话剧史，总政正在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史料并计划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许多老文艺工作者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正在撰写回忆录，而左莱、梁化群同志在参加编写中国话剧史的同时，已首先撰写了这部《苏区“红色戏剧”史话》。作者凭借着今天所能得到的大量翔实史料，记述了这一时期的苏区戏剧勃蓬发展的概貌，研究分析了它的特点和发展轨迹，总结了它的主要经验，从而填补了几十年来这块一直空白着的研究领域。这一成果，必将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史家的热烈欢迎。

我常想，外国的话剧形式传入我国以后，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它的发展，它又怎样在我国的穷乡僻壤生根，使苏区和后来解放区的戏剧能达到那么繁盛的状况，达到那么宏大的规模呢？它的生命力何在呢？读了这本《史话》，我觉得它对这个问题已经用事实给予了极好的回答。从这本《史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我国，话剧确实是应“运”而生的。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其谋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中，需要用文艺来进行自我教育，来团结自己的队伍和鼓舞自己的斗志。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运用民歌、曲艺、绘画等手段之外，也选择了从国外传来的话剧这一可以迅速反映现实生活和传输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话剧正是这样应运而发展起来的。那时没有“戏剧危机”，因为它所描写的人和事为人民群众所关心，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人民群众的情绪完全合拍，所以一有演戏就人山人海。《史话》记述了当年演出话剧时台上台下情感交融的动人情景，这情景也是我们从事过抗战戏剧的人多次经历过而深深怀念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是如此，在苏区和后来的解放区，

这种规律性就看得更为明显。在那里，演剧活动不是作为人们的谋生手段而延续着，也不是凭了从业人员单纯的 对 艺术 的 爱好来支撑，它是作为反映人们的斗争生活，宣泄人们积聚在心头的痛苦和欢愉的情感，鼓吹革命的道理，以此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当年工农剧社的社歌中甚至明确地宣称“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初工农红军的领导人也参加演剧，为什么编导、演员作为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也在从事着战争所需要的其他工作，而且“红色戏剧”的团体——剧社竟同时成为培养政治干部的学校。戏剧的这种明确的目的性，这种以戏剧为武器的自觉，这种以戏剧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责任感，比之单纯的为了艺术，实在是优胜得多，先进得多。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戏剧，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着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恐怕是没有的。这一特点，包括它的优越的方面和局限的方面，就是我国话剧的传统。今天的历史条件不同了，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因此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对于当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红色戏剧”，则应该给以历史的正确的估价，而不应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些宣传品而嗤之以鼻。

《史话》中记述了苏区红色戏剧的开拓者们的卓越的工作。有些前辈如瞿秋白、胡底、钱壮飞等同志，早在当时就英勇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有些前辈如沙可夫、李伯钊、危拱之、石联星等同志，在建国以后也相继辞世，从事过当时苏区“红色戏剧”的老一代人已为数不多。总结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段重要历史的工作，落在了我们后人的身上。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它

的经验，分析哪些是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在今天看来是不足为训的；哪些在今天仍有其宝贵的价值。本书所提到的苏区“红色戏剧”的一些基本经验，如反映火热的现实斗争，描写关系到国家人民命运的重大的题材，描写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以及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这对我们当前戏剧工作的发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继承这一优良的传统，发展这一优良的传统，应当是我们这一代戏剧工作者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是为序。

前 言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井冈山开始，高举“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旗帜，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光辉标志。“红色苏维埃”的历史时期虽为时不长，但意义重大，它将载入千秋史册，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在红色苏维埃的解放的土地上，兴起了以话剧为中心的革命戏剧运动，人们称它为“红色戏剧”。它是中国话剧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也将载入史册、永放光芒。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正是在这两种反“围剿”的斗争中，革命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戏剧运动冲破白色恐怖，以舞台为战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话剧艺术成为时代的号角，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在革命根据地是另一条战线，在红色革命政权下，话剧作为党的有力的宣传武器，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起到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并以空前的规模普及到广大农村和前

线，成为群众所喜爱的革命戏剧。

由于当时处在严酷战争岁月里，由于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红色戏剧”的史料很难完整的保留下来。因此，在群众中，甚至在文化界、戏剧界，长期以来对苏区“红色戏剧”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当人们知道一些情况、发现一些史料之后，对“红色戏剧”就产生很大的兴趣。一九五〇年六月，在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先驱者瞿秋白就义十五周年时，李伯钊同志发表了《回忆瞿秋白同志》一文，她作为苏区“红色戏剧”的开拓者之一，回忆了瞿秋白对“红色戏剧”的关怀和领导，简要地记述了苏区的戏剧活动以及创建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情况。这些片断的历史回忆，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一九五七年，在纪念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的活动中，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其中收录了赵品三的《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石联星的《难忘的岁月》、李伯钊的《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演出的剧目》等文章，更为详细地介绍了苏区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披露了许多生动的史料。一九六〇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色戏剧》一书，辑录了当时搜集到的苏区时期的戏剧、演唱作品二十五篇，其中多幕话剧十个，独幕剧、短剧、活报剧八个，歌剧四个，演唱材料三篇，人们第一次见到了“红色戏剧”的文学本。

戏剧界和从事文艺研究工作的同志对这些珍贵的史料非常重视，人们看到了“红色戏剧”的一个轮廓。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也根据这有限的材料专门介绍了苏区的“红色戏剧”。但是，对苏区戏剧的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正处在方兴未艾之时，文艺界也进入了动乱的年代。

在我国对苏区“红色戏剧”的研究工作处于停顿的时候，我们的邻邦日本的一些学者、研究工作者却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对中国苏区的文学、戏剧运动进行了专题的研究。

一九七〇年以来，樋口进、秋吉久纪夫、中野淳子诸先生都有论著发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九年日本出版了福岗女子大学秋吉久纪夫教授编的《江西苏区文学运动资料集》，辑录了丰富的史料，内容都是苏区的戏剧运动资料，其中包括许多苏区当时的报刊和党内文件的珍贵资料。一九八五年日本又出版了早稻田大学讲师中野淳子编的《江西苏区红色戏剧资料集》，收录了苏区“红色戏剧”的二十五个剧本。这简直是个奇迹，经过了苏区残酷的反“围剿”战争，又经历了以后的许多动乱，当时苏区油印的剧本，居然还保留下来并流传到海外，居然还有人把它收寻汇集起来。这份材料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所收藏，印有陈诚的收藏章，后被制成显微底片，收藏在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库里。中野淳子女士热心于研究苏区的戏剧，她得到了这一底片。由于原件印刷和底片都质量不好，她用显微阅读器对照阅读，费了很大力气才搞清楚，并誊写整理出版。这些剧本是我国出版的《红色戏剧》一书中都没有的，这些流失海外的孤本又回到了我国。中野淳子女士还发表有《瑞金时代的演剧》和《李伯钊与石联星》两篇研究苏区戏剧的论文。日本的学者和出版界所做的这些工作，对我们开展苏区戏剧的研究，不但有切实的帮助，而且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外国友人研究中国五十年前苏区的戏剧，自有很多困难，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我们国外的同行们已经走到我们前头了，作为中国的戏剧研究工作者，如不赶上去，真是愧对先烈，愧对前辈，也愧对后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国文化界、戏剧界以及史学界也开始关注苏维埃时期革命诗歌、革命戏剧的研究。著名戏剧家李伯钊一九七九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以《向前看》为题作了长篇发言，她强调瞻望未来要总结过去，她畅谈了苏区“红色戏剧”的兴起与繁荣，给以历史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规律。一九八一年在红都瑞金举行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汪木兰撰写了关于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专题论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近几年来花了很大力量组织撰写部队文艺史，他们邀请了红军老战士开座谈会、写回忆录，收集到许多宝贵的苏区戏剧的资料。总政文化部搜集的文化史料，以及一些省、区搜集的革命史料，不但丰富了江西苏区、中央苏区的戏剧运动资料，还使我们了解到中央苏区以外的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戏剧史料，例如广东海丰苏维埃时期的新剧活动和海南岛苏区工农红军中的戏剧活动，都有新的发现。

近几年来，我们在参加撰写《中国话剧史》的过程中，在写作关于沙可夫、李伯钊、石联星的评传中，又接触到一些关于苏区戏剧的新材料。在接触这些史料中，在采访中，都给我们很深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所见所闻，使我们萦萦于怀、不能忘却。

我们长途跋涉，访问了红色苏维埃首都瑞金，访问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仍可依稀感受到昔日红区的环境。在瑞金，我们看到当年召开全苏代表大会的八角大礼堂仍巍然屹立，毛主席旧居处参天的香樟树一片葱笼。沙洲坝教育部办公的祠堂也辟为纪念地，这里留下

过瞿秋白、徐特立等同志的足迹。我们随着向导走到离瑞金城十几里的赖屋村，泉水环绕着十几户人家，村舍中有一大间过厅，一位老人介绍说，这里还是苏区时期的旧房屋，当年高尔基戏剧学校就在这间过厅里排戏，他指着厅堂两旁的小阁楼对我们说：“剧团的一些同志哥就睡在这里呢！”在海丰县城，当年工农政权所在地“红宫”已成为纪念馆，一些布置再现了当年的风貌。“红宫”旁的“红场”是一个开阔的大操场，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介绍：就是在这里高举红旗宣告了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就是在这里搭台演戏、庆祝新生……在我们脑际浮现出人山人海的火热景象。

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使我们能在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瑞金革命博物馆、红宫纪念馆等处看到了许多当年的报刊、文件和实物等珍贵资料。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共青团刊物《青年实话》、党刊《党的建设》、红军部队的《红星报》以及一些铅印与油印的文件、宣传材料、剧本等。这些材料有的已经破损，有的残存着水浸和潮湿的霉点，有的烧焦了一角，它带着经历了战争风云和漫长岁月的痕迹。这些原始资料是最可靠的历史见证，它丰富和核正了许多史实，它也使我们感受到那艰苦奋斗的年代。

我们还访问了许多当年的老红军，他们中间有的现在还担负着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百忙中抽空与我们交谈。有的已退居二线，则非常乐意拿出很多时间向我们介绍情况，与我们交换意见。这些满头银发的革命前辈，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似乎又变成了年轻的红军战士。在武昌东湖之滨，潘振武将军与我们促膝倾谈，他时而沉浸在严酷战争岁月里，时而敞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他在苏区曾长期担

任红军部队里的俱乐部主任并参加了演戏，对苏区的戏剧活动接触很多，今天在他的客厅里还挂着“红色戏剧”的实践者和领导者赵品三的墨迹。他离休后倾注了很大精力写出一部关于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的长篇回忆录《战歌春秋》。他希望文化、戏剧界能尽快写出苏区的戏剧运动史。这位老将军把自己尚未发表的回忆录交给我们参考，表现出他无私的支持和热切的期望。

当时直接参与艺术创作活动、开拓“红色戏剧”的骨干人物尚健在的已经不多，瞿秋白、胡底、钱壮飞、李克农、沙可夫、危拱之、赵品三老同志都先后牺牲、谢世。令人庆幸的是，李伯钊、石联星、韩进这三位“红色戏剧”的先驱者，近几年来又发表了一些关于回忆苏区戏剧的文章，并直接与我们多次交谈，为我们提供材料，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在我们撰写李伯钊、石联星传记的过程中，她们非常谦虚地对待自己，绝少谈自己的杰出贡献，却由衷地赞扬“红色戏剧”的广泛影响和战斗作用，介绍了“红色戏剧”的演出形式、艺术特点，谈到了她们同辈战友的许多贡献和成就。她们抱病认真审阅我们写的一些材料和稿件，还把她们难得搜寻到的照片和剧本，都提供给我们使用。她们见到日本出版的关于苏区戏剧的资料和研究文章都很高兴，但更希望我们国内有这方面的论著早日问世。令人悲痛的是，石联星同志于一九八四年八月、李伯钊同志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先后病逝。她们的谆谆教诲、殷殷期待使我们永远难忘。

通过石联星我们找到韩进同志。这位在三十年代初期“左联”培养的工人作家，到中央苏区以后担任了《红色中华》的编委，他写了不少话剧和活报剧，对苏区“红色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他在建国后受高岗和康生的诬陷打击，蒙受了三十